第一章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少 年 时 代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 年 10 月 2 日，诞生于湖南冷水滩市（原属零陵县）蔡家埠灌塘口村的一个佃农家庭。

冷水滩历史悠久。夏商为荆州之域，春秋战国属楚南之境，秦朝属长沙郡，西汉属泉陵国，东汉至南朝属泉陵县，隋朝至民国属零陵县。“冷水滩”一名，相传为徐大纶所起。徐大纶是嘉庆年间的县丞，由于他居住在湘江之滨的沙滩上，滩子的东门有一座河崖，叫做“冷崖”，崖下有水，叫做“冷溪”，冷水滩由此而得名。

冷水滩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地理优越。处湘江上游，东邻祁阳，南毗永州，西连东安，北接邵阳。地势北高南低，地貌以平、岗为主，兼有山、丘。冷水滩是零陵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故有“零陵地区北大门”和“湖南省西南门户”之称。

在离冷水滩不远的地方，有个只有十几户人家，老幼不上一百人的村落，地处湖南西南边界，背靠湘水，人称蔡家铺的油榨头灌塘口（今属岚角山镇）。这就是李达一家祖祖辈辈耕作生息的地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达祖父李光亮，靠着几亩薄田，艰难地养育两男两女。为挣脱贫困处境，李光亮设法让次子李辅仁读了几年书。李辅仁教过蒙馆，当过学徒，干过银匠，做过小生意，依然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只得回家租种地主的土地。李辅仁就是李达的父亲。他是勤劳朴实、憨厚秉直的农民。李达的母亲胡氏，连名号都没有，是一位典型的山村农妇。她每天黎明即起，干完家务，便同男子一样下地干活，夜晚纺线，直到鸡鸣。李达有两兄两弟和一个姐姐，都是农民，苦于贫困无法读书。

李达家向地主佃田 20 多亩。每年秋后，金灿灿的稻谷，一担担地挑进地主的粮仓。一亩薄田要交租九斗九升，遭遇灾害，也不得少交一粒。眼见此情此景，李达极感心痛，愤愤不平。

李达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深得父母喜欢，因而他在兄弟中独享专心读书的厚遇。李达父亲就是勒紧裤带，也要凑合几串铜钱做束脩供他念书。

李达刚满 5 岁，便跟父亲识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四言杂诗》等小书。后来，又跟父亲学童谣、唱民歌、做对子（联）。7 岁，拜胡燮卿先生为师。胡先生是前清秀才，算是乡下的一个“大学问家”，和李达母亲同乡同姓，论辈份排起来还是兄妹，李达算是他的外甥吧。

有一天，胡燮卿先生来到李辅仁家里，特意试试李达的聪慧。他先听李达背诵了《三字经》、《百家姓》，又教了他几首唐诗，然后叫他背诵。年仅 7 岁的李达，竟流水般地背了出来。胡先生又和他对对子，上联是“油榨头油榨榨油”。李达略加思索便脱口而出下联：“水车坝水车车水”。因为油榨头是李达家的村名，水车坝也是村名，在李达外婆家那边。胡先生问道：“做对子有什么妙法？”李达胸有成竹地回答：“对对子要名对名，动对动，云对雨，雪对风，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一背一大串。胡先生连

声叫好，此子可教也！见李达聪明好学，特别喜爱，当即答应认李达为义子。无论在哪里教书，老人家总是带着李达在身边跟读。胡先生在李辅仁面前一再夸奖：“鹤鸣伢子（即孩子）真有出息，书点到哪里，他就背到那里。一本书教完了，他也就背完了。鹤鸣前途无量啊！”

李达又聪明又顽皮，在唐家祠堂读《幼学》、《千字文》之类的启蒙书时，唐花圃老师叫他背诵二三十句，他并不在乎，很快就背熟了。课后经常拿着小刀在祠堂墙上刻字，雕菩萨。老师把背书的份量加重，这也难不着他，只要坐下来认真读上几遍，他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一次，他把祠堂的墙壁雕得乱七八糟，老师很生气，便把订书的锥子朝他的书上用力一插，锥尖钻穿多少页书，就要他在限定的时间里背多少页。老师原以为这样可以治服他，但是，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又背得滚瓜烂熟了。

过了几年，李达不调皮了，听讲认真，作业工整，到校最早，走得最晚。他读过的书，注释和眉批写得密密麻麻。他不满足于老师指定的课文，大量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文学名著。他特别喜爱数学和自然常识。他好学多思，碰上难题，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它搞懂弄通。他爱和同学争论问题，有初步的独立思考能力。

1905 年，永州府在当地蘋州书院的基础上开办永州中学。李达刚满 15 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学校，并获得公费待遇。

永州中学是当时零陵、祁阳、东安、道县、永明（今江永）、宁远、江华、新田八县的最高学府，在湖南也颇有名气。它位于潇、湘二水汇合之处的蘋岛上，风景秀丽，堪称“水上桃源”，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当时，能够考取永州中学的人，犹如中了状元一样引以为荣。

这年春天，李达父亲和胡燮卿先生亲自乘木船，送李达到蘋

州应试。一路上又是鼓励，又是鞭策。胡先生以“东西两河皆蔡市”为上联，叫他作对子，他略加思索，便说：“潇湘二水汇蘋州”,对答如流。

考生中李达年纪最小，个子最矮，特别引人注目。许多人十分惊讶，纷纷围过来，端详着这个乡下少年。主考老师好不容易才将围观的人赶走。李达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回答了所有的试题。

这回考试，李达的数学成绩得了满分，八股文章考得不合章法。省里派来的主考官，重文轻理，满肚子的八股味，不想录取李达。由于校长和教导主任委婉求情，李达才得以录取，但是排名在最后。

考第一名的是朱保善，比李达大五六岁，古书读得多，善长八股、诗词，非常骄傲，甚至当众挖苦李达，污辱李达。李达针锋相对，冷笑着说：“看谁笑到最后。”从此，李达暗下决心，力争赶上并超过朱保善。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整整一个暑假里，李达闭门不出，夜以继日，埋头攻读诸种古今文学名著，分门别类，精心研究，终于领悟到了撰写作文的真谛和要领，并亲自实践，写出了十多篇文章。然后送请胡、唐两位老师批阅，自己反复修改校正，从中精选若干篇作为习作。

第二学期一到校，李达便将自己的习作，毕恭毕敬地送请国文老师批阅。国文老师阅后大喜，并从中选出一二篇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讲。

李达由于国文水平的提高，作文成绩进入优秀之列，加之，数理成绩特优，所以，学期末的总平成绩跃居榜首。李达戒骄戒躁，继续发愤攻读，每个学期的总平，都保持第一名。

19世纪 9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瓜分

势力范围。那时，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也日益高涨。

1900 年，反抗列强的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夏秋间，京津地区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野蛮侵略，全国反侵略斗争风起云涌。8 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01 年 9 月，清政府俯首接受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是清政府对中国主权的一次大拍卖。清政府从此成了“洋人的朝廷”。

1903 年春，强烈声讨霸占我东北国土的“拒俄运动”高涨。1905 年 8 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协商，联合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十分迅速，“革命浪潮一日千丈”。1906 年 12月，同盟会会员联络洪江会等会党，发动了萍、浏、醴起义。以后相继爆发了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钦、廉、防城起义，全国革命形势呈现出高涨之势。

早在李达 10 岁那年,即 1900 年 10月，他就听到老师和长辈人说，有八个洋鬼子国家，结伙攻打中国，打进了京城，把皇帝都赶跑了，后来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这就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到了 15 岁，即 1905 年，李达在永州中学开始接触了新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知道“八国联军”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帝国主义国家，懂得了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就是因为列强的掠夺、国内政治的黑暗和清政府的腐败媚外。他也有了初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萌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

有一天，李达和他的几位同学接到了长沙寄来的一封信，传阅后，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李达提议说：“我们将这封信向全校老师们和同学们宣读，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以实际行动声援徐老先生。”

信中谈到，湖南辰州发生过一桩教案，事后，卖国政府为讨好帝国主义，规定辰州人 5 年内不许报考科举，还惨杀了一个与教案有关的人。当地知县因收尸时哭了一场而被免官。有一回，徐特立给修业学校的学生作时事讲演，将“辰州教案”和“八国联军”这些国耻沉痛地讲给学生听。他声泪俱下，悲愤至极，讲完后立即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当场斩下一个手指头，写了血书，借以表示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愤恨，立下为国家民族雪耻的决心，激励学生们反对列强的欺凌和反对清朝政府的卖国行径，为国家兴亡尽匹夫之责。

徐特立这一充满爱国激情的壮举，深得各界人士的钦佩，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李达念完信后，悲愤交加，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一致行动起来，坚决反对列强！反对卖国行为！”

顿时，全校师生心潮澎湃，激浪翻滚。蕺岛沸腾了！潇、湘两江怒吼了！大家当即议了两条办法：第一，抵制日货（按：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充斥于中国市场，阻碍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第二，练军事操。

说干就干。同学们纷纷跑回教室和宿舍，翻箱倒柜，将所有日本制造的文具用品找了出来，集中堆放在操场上，一把大火，爱国主义的熊熊烈火，将这些日制文具用品焚烧得一干二净。

事后，学校补发给他们的一套文具，还是日本货。大家提出抗议，嚷嚷着又要焚毁。校长近乎哀求地说：“我们的国家工业不发达，文具用品只好暂时用外国货，不要再烧毁了。”李达和同学们听了，倒吸了一口冷气，感到耻辱。

为了实行第二条，在李达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学校搞来了两百支来福枪，并请来了教官。李达和同学们在更加刻苦学习的同

时，便抓紧苦练军事操。

李达以后回忆此事说：“当时我们爱国的办法，就只懂得这么两条。这类的反帝爱国运动在那时是年年都要举行的。每逢帝国主义者向清廷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件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就集会、游行、呼口号、发宣言、向清廷请愿。”[1]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除了一部分为外国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服务的文化汉奸和文化买办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程度不同的爱国主义者。记得前清末年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向清廷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约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便举行一次爱国运动，每年一次或两次，今天反英，明天反日，后天反德、反俄（沙皇俄国），反法，反美，总是反个不了”[2]。

李达品学兼优。从十五六岁起，他就开始懂得为劳动者着想，为贫苦农民做好事，并自发地起来同官僚地主作斗争。

有一天，他到县城办事，看到农民在县粮饷局交粮。粮饷局的官“老爷”故意刁难农民，多算了粮饷。农民说：“你们算错了，怎么还要多算我的呢？”收饷的那家伙听了大发脾气，拍桌子，瞪眼睛，威胁说：“我算错了，你自己来算吧！”企图吓倒那位农民。李达挺身而出：“我帮他算，你不要欺侮人！”那个家伙原以为李达是个小小“乡巴佬”，一定算不出来。不料李达却算出了正确的结果，粮饷局的人被迫认输。

有一次，灌塘口的农民用船运石灰，经过葵家铺，看到几只大鹅顺流而下，就捡了起来。这几只鹅是省参议员、大地主胡棠侯的狗腿子胡海田的。胡海田狗仗人势，狂叫农民偷了他家的鹅，要锯农民的船。当时李达在场，他当着胡海田的面，理直气壮地说：“鹅是大水冲下来的，你不能诬陷好人！要锯他们的船，毫无道理，相信你也不敢！”这个地主狗腿子理亏心虚，只好作罢。

从 15 岁到 18 岁这个年龄，正是对一个年轻人的思想气质的

形成有重要影响的时期。在这一个时期，李达已经有了初步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

当时，中国已经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处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下，怀着拳拳赤子心的李达，加紧发愤读书，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行动，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进京赴日求学

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随之摆在他面前的是向何处去。升学呢还是工作呢？那个年代，连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何况一个中学毕业生！寻找工作谈何易。至于考大学，李达完全有把握，但高额的学费对于农家弟子来说是无力负担的。所以，他只能选择报考高等师范这条路。

这年秋季，李达打听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招收新生。这是一所国内著名的高等师范学校。他父亲想方设法筹集了一笔川资，让他到北京报考这个著名学校。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偏僻的农村，到大城市去。在途中，李达目睹了许多令人愤慨的帝国主义侵略的行为。

在汉口，李达看到宽阔的江面上，帝国主义的商船炮舰，星罗棋布。临江远眺，满江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异国国旗。他住在租界里，看到一幢幢砖垒石砌的洋楼大厦，这些鬼影似的大建筑物都是外国侵略者榨取中国人的血汗修建起来的。列强把租界当作欺压中国人民的据点，租界成了国中之国。

他从汉口坐外国船到上海，这里更是外国强盗耀武扬威的地方。上海的租界要比汉口的租界大得多，这又是一个国中之国。有一次，他想去外滩公园里看看，走到门口，一个印度巡捕拦住了

他，那个家伙用指挥棒指着一块牌子给他看，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真是令人气愤！在中国的土地上把中国人和狗同等看待，岂有此理！

他到了天津，也住在租界里，这又是一个国中之国。到了北京，北京也有个国中之国，就是东交民巷。

从一路的所见所闻中，他“悲愤地觉悟到，中国已经变成了列强统治着的殖民地了！”[3]百闻不如一见，亲自见到的东西比书上讲的或听别人说的要领悟得快些、多些，这比李达在中学读书期间带领同学们焚烧日本文具的举动所达到的认识要深刻得多。

李达抱着学好科学知识、振兴祖国的志向考入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但是，他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两年，就感到“学政”腐败。该校的学政强迫学生身穿长袍马褂，戴着“顶子”，向孔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学政则不学无术，官气十足。看到这种情景，此时此地，李达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到这种地步，是由于知识不发达。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普及科学知识，唤起人民的觉悟，才能国强民富，才能消除愚昧落后。于是他有了教育救国的理想。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一举成功。不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先后响应，宣告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清朝统治迅速解体。12月,孙中山由海外归国,被17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组成临时政府。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宣告退位。从此，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逐渐深入了人心。李达和全国人民一样为此振奋，“以为这一回，中国得救了”。但是不久，孙中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宣布辞职。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取代了清王朝。

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全国人民很失望，李达也很失望。是年秋，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他只好返回故乡。次年，他到祁阳中学教书半年，继而就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两个月后，因缺乏食宿费，转入湖南优级师范。

李达深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思想影响，决定“放弃‘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实业救国’”，决定不学师范，改学理工科”。他“参加统考到日本去留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的”[4]。

1913年，李达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费生。他想借这个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的志愿。

在留日官费生中，李达名列第二，仍觉自己没有考好，他认为应该考第一。以后，在日本真的考了第一名。短短一年光景，他首先集中精力学习外语，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地学，不仅学会了日语，后又学会了英文和德文。因用功过度，得了肺病。贫病交加，他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回国后，他在家与一位中医师合伙开办“博记药店”，一面当药剂师，发药卖药，一面养病。过这种“药商”生活将近3年，肺病算是好了。

1917年春，李达第二次去东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理科。那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日本的五个国立学校之一的，都给官费。五个高校中，最著名、最为当时青年所倾慕的是第一高等学校。李达考入了这所学校，当然非常高兴。他觉得这下不但经济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实业救国”的理想也可以实现。入学以后，他刚天亮就起床，晚上11点才睡觉，每天学习12—13个小时。他满以为只要刻苦攻读理工科，就可以达到拯救祖国的目的。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下，且不说发展实业和科学，就连民族独立、主权完整也谈不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达后来逐步

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和中国的留学生饱尝了不堪忍受的欺凌侮辱。学校里的教师，大都瞧不起他们，认为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这些低能儿怎么能同我大和民族的后代相比呢。”日本同学也如此说。走到外面，连小孩子也成群结队地跟在后面指着骂他们是“亡国奴”“猪尾巴”,日本大人则在一旁嬉笑或袖手旁观。这种侮辱性的叫嚷，实在令李达和其他留日同学难以忍受。日本小孩嘲弄别人时，总是爱说：“笨蛋笨蛋，你的老子是个支那人”。“支那”一词出自日本人之口时，鼻头一皱，鼻音拉长，极尽鄙视之态。在留日学生听来，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之情，涌上心头，反感至极！

报刊杂志充满了掠夺中国的叫嚣声，中学地理课本上和小学常识课本上，竟画“一头猪”来代表中国。中国人被当作贱民，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轻侮他们的日本人不限于某一阶层、某一职业。上自教师、同学、记者、编辑、警察，下至房东、下女、车夫，几乎无所不有。

在这种情形下，李达和中国留日学生，普遍感到耻辱，并滋长了反日情绪。留日学生乃至中华民族绝对不是天生的排日或反日，而是日本人与其政府对华侵略野心和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人的侮辱——这种侮辱并不只是对留日学生的侮辱，而且也是对中国、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侮辱，才激发了留日学生的排日反日意识。

1914 年第一次帝国主义间的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欧洲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大举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侵略。攻占了原来德国所盘踞的胶州湾，占领了山东。1915 年 1 月 28 日,日本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心理，更是乘机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的“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一条”。主要内容包括：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延长租借旅大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为99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附近矿山不准他人开采；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由中日合办，军械半数以上应采自日本，或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等。“二十一条”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又一严重步骤。留日学生闻讯，愤起反对。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发通电、开大会、散发传单，表示强烈抗议。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连开会的会场也很难找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会场，刚刚开会，警察跑来把他们驱散。他们沉痛地感到，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如果不找新的出路，中国一定要灭亡。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李达后来回忆说：“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5]

从爱国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正当李达为找不到救国救民的出路而极端苦闷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响了。它震动了全世界，也震动了中国人，特别是震动了富于政治敏感性的中国知识分子。

李达和许多先进分子一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国救民的普遍真理。

在东京，李达从日本报纸上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他听说列宁领导的“过激派”实行“过激主义”，领导推翻了沙皇政府，

建立了劳农专政，认为这是破天荒的大好事。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感到无限的喜悦，就留心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所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6]。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批探求救国救民出路而不得其解的中国先进分子也就开始把寻找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日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爱国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介绍还是很零碎的，而且这些零碎的介绍又要受到反动当局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和删削，如日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就被删去了很多，人们也就无法系统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李达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illegible]放的新希望，于是，不顾马列著作的缺乏和反动当局的禁止，开始学习、研究指导十月社会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的重要启迪促进了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促进了他由爱国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李达积极地投入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斗争的实践进一步加深了这个青年爱国者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特别是他率领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回国请愿那次斗争，对于他由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8 年 5 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中国的北满等所谓“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中国还要为日军提供“军事共要之地图及情报”，供给“共同防敌所需之兵器及军需品

并其原料”，中国地方官员，对军事行动区域内的日军“须尽力协助”。协定还规定，在日军进攻苏俄时，凡加入共同行动之中国军队“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7]。日本的意图是在中日共同抗苏俄的名义下，以协同作战为幌子，编练中国军队，掌握中国的军事大权，使中国军队成为自己的仆从军，进而干涉中国内政。

尽管日本政府严密封锁消息，但中国报纸仍有隐约的披露。留日学生闻之大哗，当即召集大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勾当，并且议决全体归国，唤起国内舆论。在五四以前，国内学生运动未起，每次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都是由留日学生充当先锋和主力。 5 月 6 日，即中国人民的“五七”国耻日前夕，留日学生代表在东京神田的维新号饭店召开秘密会议，进一步商讨救国大计。正当会议进行之时，日本警察数十人与侦探数人持枪闯入，不问情由，拳打脚踢。顿时，桌椅翻倒，杯盘狼藉，场面混乱不堪。“连三名女学生在内，一共 46 人全被逮捕至西神田警署’[8]。

为了抗议日方的暴行，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学生们纷纷罢学。据当时日本警察厅调查，东京各校中国留学生罢课者在 96％以上。[9]另据当时中国方面的统计，在 3548 名留日学生中，归国者 2506人，占总数 70％以上。

这两千多名留日学生组成“救国团”回国请愿。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等都是这时回国的。他们回国后，以上海为大本营，在京津沪等地往来奔走从事救国运动，进行宣传联络。“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为首的就是李达”（许德珩语）。此外还有黄日葵、王希天、阮湘等人。他们 5 月中旬到达北京，下榻于湖南会馆。旋即到北京大学进行联络，同北大学生领袖邓中夏、许德珩等“商量好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10]。20 日晚，又共同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大会。会上，留日学生归国团代表发表了慷慨

激昂的爱国演说，陈述在东京遭到的种种欺凌和屈辱。会议决定第二天到“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北大、高师、高工等校学生两千多人，聚集在新华门“大总统府”门前，坚决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他们推举许德珩、易克嶷等8名代表，向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递交了请愿书。“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11]。

这次请愿，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周；由于请愿学生在思想觉悟、政治经验和斗争方式上幼稚；由于未能唤起全国各界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的一致响应；由于段祺瑞政府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以及队伍内部傅斯年、范恺、吴澄等人的破坏捣乱，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在北洋政府严令取缔、社会舆论的冷遇和父母兄弟的劝告下，归国留日学生大多只好忍辱负重，重返日本复学。

请愿斗争的失败，给李达震动很大，他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也行不通。唯一的出路，“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12]这是从回国请愿斗争的失败教训中获得的深刻教训，对李达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决定性作用。

这年6月返回东京以后，他毅然放弃理科专业的学习，专门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书刊。虽然那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肤浅的，但是，他攻读马列的目的是明确的，相信只有马列主

义才能救中国。经过自己的刻苦磨练，不断改造旧的世界观，逐步树立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五四运动以后，李达终于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

1919 年 5 月 4 日，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当时，李达在日本。他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6 月，他得知“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被捕，立即赶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寄回国内发表。他的文章除了热情赞颂陈独秀、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外，还坚定地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他满怀信心地指出：“顽固守旧的政府能捕得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一个人,不能捕得许多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人。纵使许多人都给政府捕去，那许多人的‘精神’还是无恙的。”[13]他认为，若不用“新思想”去“建设改造”新国家”,就“不能立足在二十世纪！”所谓“新思想”“新国家”,李达虽未点明,但实质上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式的国家。

五四以后，中国掀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刚刚兴起，李达在日本就积极为国内报刊撰稿。早在 6 月 18 日和 19 日，他第一次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公开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这是现已搜集到他最早的两篇珍贵文稿。这两篇文章的基本思想，都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

第一篇文章，初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理，简明扼要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当时，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已经开始广泛传播，然而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十分模糊的，还分不清社会主义各派及其主张的界限，张冠李戴的社会主义层出不穷。针对这种情况，李达首先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终极的理想”，私有制

是最终要消灭的，但是“现在社会主义的纲领，还没有主张到这个田地。”[14]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和政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者的区别按照李达并不科学的表述是：“社会主义是主张共同的生产及支配，共产主义是主张共同的生活。社会主义是主张全废私有资本，没有主张全废私有财产。共产主义是主张全废私有财产，各人应以财产献出给社会共有的。”[15]但他从生产、分配和财产所有关系上说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却是从本质上认识问题的。其次，他又说明了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指出无政府主义的根据是所谓“个人主权的哲学”，他们的主张是说人人都是主权者，没有受政府统治的必要。“全然不承认有‘国家的组织’”，“社会主义虽然也不承认资本主义”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但是主张“要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政府”，这“和那无政府主义根本打破政府组织是不一样的”；“再就他的手段说来，也是不同的”。李达无情地嘲笑那种张冠李戴的假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各有各的主张，不能笼统说的。近时很有人把社会主义当作共产主义，也有人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实在可笑得很，又是可怜得很。”[16]这是李达对假社会主义的最初批判。这种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进行区分的思想，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篇文章，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目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后，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它是古已有之的社会理想和伦理思想。李达针对这种曲解，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的产物。”19 世纪以前虽然也有类似思想，但是作为一种主义或学说，造成时代的一种势力，并成为学者研究的目的物即对象，“的确是 19 世纪初期的事实。”这是因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